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巴黎公社政治实践再探讨

孙代尧 李 钰

[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既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制度的理想,也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是使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途径,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决定着社会主义的理想性与现实性能否实现统一。巴黎公社在政权建设实践中,出现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在政权初创时期,公社错估了社会成员的政治能力,将无产阶级国家权力全部移交给社会,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领导的政治组织未能贯彻执行加强政治建设、军事领导、消灭私有制等任务,造成了政治实践的超阶段性和不彻底性,巴黎公社最终走向失败。纪念和缅怀巴黎公社,就要妥善对待巴黎公社的历史遗产。“不应当盲目重复他们的每一个口号”,而应当吸取公社政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考虑现实条件下社会成员政治能力的负载力和政治组织的执行力,及时对政治实践作出调整,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这是巴黎公社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 巴黎公社 社会主义理想 政治实践 政治能力 政治组织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21.02.003

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从理想到运动再到制度的奋斗史。“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 [gegenständliche] 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①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始终是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目标。巴黎公社被列宁誉为“19 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伟大的典范”^②,也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但公社在政治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失误,未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和现实的统一。

本文拟从巴黎公社政治实践中呈现的社会理想与政治能力、政治组织之间的张力的视角,对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作进一步探讨。

一、政治实践: 社会理想和现实统一之中介

1871 年 3 月 18 日,法国巴黎人民群众的一场革命行动揭开了巴黎公社的史诗序幕。正如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13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增订版第 16 卷第 436 页。

宁所说,巴黎公社不是一次地域性革命或民族战争,公社战士“是为全体劳动人类、全体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的解放而斗争”^①。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了政权,进行了创造新世界的伟大探索,“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②。

巴黎公社的悲壮失败,招致了资产阶级的攻讦。资产阶级学者把巴黎公社的失败归结为乌托邦幻想的破灭,讥笑巴黎公社的“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是徒劳”^③,“公社的事情只是破坏和毁灭;它的政治制度只是可笑的仿制品,它的经济改革是荒谬的、滑稽可笑的,在管理方面它除了保持原有的东西以外什么也不会做;它封闭在渺茫的理论当中,而它所宣布的‘美好的’社会纲领并没有实现”^④。将巴黎公社视为乌托邦,实际上是将巴黎公社践行的社会主义理想等同于乌托邦幻想。对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巴黎公社“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⑤,它在经济、政治、社会、军事领域推行的改革和新制度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⑥。1871年5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指出,即使巴黎公社失败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这些原则将一再凸显出来,直到工人阶级获得解放”^⑦。

围绕巴黎公社是否是乌托邦的争论,产生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命题。而如何把握社会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之关系,也是很多社会主义者的绊脚石。社会主义既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价值理想,又是力求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活动。现代社会主义诞生于16世纪初,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对理想社会制度蓝图的描绘出现的。“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人物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⑧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即是借对“最完美的国家制度”的设计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改造社会的设想。这也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与其他社会理论的不同之处。此后,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约翰·凡·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等,也都试图构建一个美好

之地或理想国家来寄托自身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价值期许。到了18世纪,社会主义进入理论论证阶段,如恩格斯所说“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⑨,其特点是用“法典”形式对社会主义作出明确规定,且已经有了先驱实践。此后,无论是格拉古·巴贝夫、埃蒂耶纳·卡贝、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威廉·魏特林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还是傅立叶和欧文实验的“法郎吉”和“新和谐公社”,社会主义者尝试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中进行实验,在实验中追求社会理想。19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的现实,对未来新社会的见解和制度设计更具价值,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赞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是“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创始人”^⑩,肯定他们的学说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和“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⑪

理想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鼓舞人们改变现实社会的力量。无论社会主义者的理想之境多么遥远,它的一些原则都是人类追求更好社会制度的前提。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不是乌托邦的幻想,而是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仍然需要这种理想精神。只不过,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受限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⑫,无法指出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和改造现实社会的主体力量,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难以实现。这就是相对于19世纪40年代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16—

①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20卷第2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12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15卷第216页。

④ 转引自[苏联]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9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10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10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009年版第60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81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393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777、780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31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780页。

19 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原因。与空想社会主义认为理想社会应该建立在人类理性和正义的基础上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的现实材料,“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①,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因而,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化不是要放弃理想精神,而是要从现实条件出发规划政治实践,把握好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平衡,不断促成社会理想的实现。

巴黎公社充分诠释了社会主义理想。首先,巴黎公社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3月18日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最大特征”就是人民性,这场革命的“代言人既不是律师,也不是记者,既不是议员,也不是将军。代替他们的是克勒佐的矿工、装订工人、厨师等等,等等”^②。马克思也高度赞同“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③。其次,巴黎公社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正式宣告成立,普选产生的公社委员们成为人民意志的真正代言人,“他们和群众朝夕相处,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他们遇事向群众请教,倾听群众的呼声;他们说的都是从群众那里听来的意见,仅仅是负责用简单明了的话语和关键的行动,来表达三十万人的巨大呼声和决心”^④。公社委员们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并接受选民监督,避免了少数人专政的暴政,真正体现劳动人民专政的民主政治优势。恩格斯对此指出:“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⑤公社活动家普罗斯珀·奥利维耶·利沙加勒颂扬公社是“一股不可估价的力量——像从沉船中抢救出的、拯救遇难的人们的指南针一样宝贵”^⑥。因为公社使劳动群众掌握政权,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激情,令病入膏肓的法国社会起死回生了。马克思将巴黎公社视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⑦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⑧,认为扼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⑨。

然而,巴黎公社未能处理好社会主义理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马克思指出了巴黎公社的两个行动失误:一是为了避免内战,没有在反动分子逃出巴黎后,及时向凡尔赛进军;二是“中央委

员会为了位让给公社而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⑩。恩格斯补充了两点理论教训:其一,巴黎公社的主要领导者没有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⑪;其二,没有合理利用权威,尤其是在政权初创时期忽视了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职能。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格外重视巴黎公社的政权建设经验。1908年3月18日,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大会并作题为《公社的教训》的报告,总结了公社的两大错失:一是没有及时“剥夺剥夺者”,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二是无产阶级对敌人过于宽容,“它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却力图从精神上感化他们;它忽视纯军事行动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⑫。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一刻也不应当忘记,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⑬此后,列宁在强调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建设比巴黎公社具有的优势时又多次提到,没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也是公社付出重大牺牲的原因之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巴黎公社失败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公社在政治实践上出现的重大问题,才导致公社未能达到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的预期目标。

1871年4月17日,巴黎公社正同敌人展开生死搏斗时,马克思在给友人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坦言:巴黎公社并不是在斗争机会绝对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203页。

②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1006页。

④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56页。

⑥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009年版第181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年版第354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009年版第181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494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52页。

⑫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16卷第436页。

⑬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16卷第438页。

利的情况下着手进行的,“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利的‘偶然情况’决不应该到法国社会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普鲁士人盘踞法国并兵临巴黎城下这样一种情况中去寻找”^①。面对普鲁士军队的武装侵略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不战而降,巴黎无产阶级选择用战斗的姿态来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公社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是值得肯定的,它的精神感召力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公社没有把握好成员的政治能力、政治组织同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张力,未能根据现实斗争条件及时调整政治实践的步伐,导致公社走向失败,这是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教训。

二、政治能力:政治实践之支撑

“民主”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其原初意义是“人民主权”,即“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②。巴黎公社推行的全民广泛参与的直接民主,没有简单照搬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政治。公社追求的民主政治是将政治事务裁决权从少数人或个别利益集团手中解放出来归还给大多数人,以实现人民自治的“民主的社会共和国”。公社为了防止公职人员领取过高薪资而引发投机钻营、攀权附势等腐败行为,规定“公社各机关职员的最大薪金定为每年6000法郎”^③,这一薪资待遇只相当于一位熟练工人一年的收入。公社还赋予选民随时撤换不称职的公职人员的权力,连掌握司法大权的法官也可以被人民随时撤换,“他们同所有的职员一样,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受直接的追究”^④。这里体现的是建立一个“廉价政府”和“廉洁政府”的政治理想。

为了贯彻直接民主和实现社会平等,巴黎公社不仅实行了普选制,而且注重保护劳动者在选举权、社会地位、受教育权、司法、分配等领域的平等权利。第一,取消了财产资格的限制,规定凡居住在巴黎市区的市民均拥有选举权,一人一票,不因是否担任公职而使票面意义发生改变。此外,还充分考虑到各选区人数的差别,规定“每两万居民选举一名议员,其余不足两万人而不少于一万者选举一名议员”^⑤。这样,人数较多的贫民区就能拥有较高比例的委员代表。第二,允许外

国人加入公社。只要对公社事业作出贡献,不论其是否具有法国国籍,均承认其社员身份,这一举动彰显了公社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第三,将教育平等视为变革社会的重要支点,主张劳动人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各类学校应当向集体中的所有成员的子女敞开大门”^⑥;主张政教分离,努力减少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干扰,尤其是对教育的影响。第四,重视司法公正,要求司法机关尽量免收诉讼费用,保障劳动人民自由诉讼的权利,“诉讼的审理应公开举行”^⑦。第五,在经济领域,呼吁“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利益应公平分配”^⑧。但值得注意的是,仅围绕分配公平而不触及所有制问题来解决工人的贫困,显然是受到了蒲鲁东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无法彻底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此外,巴黎公社在思想意识领域也为消除特权观念、推进社会平等作出了极大努力。

从以上巴黎公社推行的政治改革可以看出,公社政治理念的核心是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对社会的控制,这正是为马克思、恩格斯所称赞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⑨。马克思曾在《法兰西内战》中分析道,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废除国家机器对社会的控制,反而此后资产阶级内部各个统治集团“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操纵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战果”^⑩。历经革命风雨洗礼的巴黎人民已经意识到,“即使把最具有革命思想的新人委派到政府领导岗位上,也是徒劳,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整个社会机器就会把他们抓住,不由他们自己作主”^⑪,只有彻底摧毁腐朽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年版第354页。

② 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页。

③ 《巴黎公社公报集》第1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21页。

④ 《巴黎公社公报集》第1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94页。

⑤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6页。

⑥ 《巴黎公社公报集》第1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29页。

⑦ 《巴黎公社公报集》第1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93页。

⑧ 《巴黎公社公报集》第1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94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95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137页。

⑪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才能获得解放。巴黎公社成立后,大量政府官员外逃至凡尔赛,“无论是在市政厅、政府各部或各区,没有一个旧职员留任”^①,这固然为公社政权的正常运转增添了烦恼(有时为了寻找常规的办公用具,社员们都需要去询问看守人),但也为巴黎公社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提供了契机。正是在主客观动因的合力作用下,巴黎公社推行直接民主和全民普选,废除旧官吏和警察、军队等暴力机关,力图一举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将国家权力重新归还给社会。

巴黎公社摧毁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无疑是伟大的创举,但没有认识到,在废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要充分建设无产阶级国家。此时的无产阶级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政权下的国家与社会也不再是二元对立关系,无产阶级国家能够保障和增进社会自治。巴黎公社急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就废除国家,但国家不是被人为“废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国家消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是阶级消失的必然产物。国家消亡的条件非常严苛,关于这点,列宁后来在《国家与革命》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如果社会不能在发展生产力、消除脑体劳动的对立、完善分配制度、使社会意识更加先进等方面发生彻底转变,国家消亡就无法实现。^②

事实证明,巴黎公社时期社会成员的政治能力尚不足以承接国家权力的转移。过早地将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全部移交给社会,推行全面的社会自治,无法适应军事斗争激烈的战时环境,也不利于巩固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公社实行直接民主、全民普选的社会自治充分体现了机会平等,但没有考虑到人们的政治参与经验、教育训练、智识水平、声誉威望等因素对制度运行的实际影响。彼时,“在市政厅执政的是一个没有名气的政府,其成员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普通工人和小职员,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的名声几乎没有越出他们的街道或工场的范围”^③,客观上造成了外省对巴黎公社的革命采取漠视态度。此外,普选产生的公社委员们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天然代表,但“太缺乏鼓舞和领导运动的经验了”^④,无力应对复杂的政治生活。公社委员们过于追求绝对平等和程序民主,忽视了对政治权威的运用,在公社会议议程、

领导权交接、指导思想等方面造成了混乱,加剧了公社的生存危机。^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⑥人能够通过实践活动,促成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但只有当人民群众的政治能力满足一定要求时,革命的实践才会成功,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与改造主观世界的意识能动性才能统一。

三、政治组织:政治实践之执行

据资料记载,在第一批普选产生的公社委员中,“布朗基派和支持这派的人物共21人,蒲鲁东派和支持这派的人物共20人。雅各宾派共12—14人。无党派的10—12人中大部分附和‘多数派’(即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⑦。布朗基派及其支持者占到公社委员总数的70.15%,是名副其实的多数派;蒲鲁东派及其支持者在公社委员中占比为29.85%,是少数派。1871年3月30日,巴黎公社成立十个部门委员会,其中,布朗基派在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中占据绝对优势;蒲鲁东派则对财政委员会、劳动与交换委员会享有实际控制权。1871年4月22日改选后产生新的执行委员会中的委员也多是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可以说,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在公社组织中占据了大部分重要的领导岗位。

恩格斯曾评价“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⑧,使得两派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自己的学说。比如,蒲鲁东派

①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② 参见《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3卷第122—128页。

③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④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44—145页。

⑤ 参见孙代尧、李钰《无产阶级国家建设中的政治秩序构建——基于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探讨》,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5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34页。

⑦ [苏联]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20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52页。

反对工业生产联合,认为联合生产束缚了工人的自由,竞争、分工、私有财产才是经济力量。但是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大工业有了较快发展,所以巴黎公社颁布的重要法令之一就是要把大工业、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以工厂内的工人联合为基础,并且把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经济基础。布朗基派崇尚密谋式的暴动,主张由少数革命领袖独掌权力,夺取政权后,再把人民吸引过去。然而实际上,巴黎公社废除了常备军代之以人民的武装,已经不再走少数革命领袖带着不自觉的多数人实施密谋暴动的老路。

列宁也充分肯定了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在领导公社政权建设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在政治改革方面,巴黎公社宣布政教分离、实行免费的国民教育、废除常备军、废除官僚制度、外国人享有同等权利,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府;经济领域,公社通过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禁止罚款、争取破产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将废弃的工厂交给工人合作社,“把寄生虫和荒淫无耻的富人的巴黎改造成工人的巴黎”^①。不过,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都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两派的思想都具有脱离实际的空想性。

布朗基派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改造社会的行动纲领。布朗基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革命家和工人运动领袖,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参与者,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在76年的人生历程中,布朗基有37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正是因为布朗基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彻底的批判态度和坚决的革命行动,马克思、恩格斯称赞布朗基及其追随者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②,“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③。布朗基在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的前一天即1871年3月17日被当局逮捕入狱,遗憾地错过了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巴黎公社,但是布朗基依然在巴黎第十八区和第二十区同时当选为公社委员。在公社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布朗基被委员们提名担任公社的名誉主席,也是被提名的唯一一位“主席”。这是因为,公社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反对“权威”,因此没有设主席。公社委员当中的埃德姆·特里东、安托万·阿尔诺、古斯塔夫·弗路朗斯、爱德华·瓦

扬和拉乌尔·里果等人也都是布朗基的追随者,这使布朗基派成为公社委员中的“多数派”,布朗基也成为巴黎公社的实际领导者或精神领袖。但布朗基缺少系统的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也较为肤浅。恩格斯曾评价道“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④布朗基派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科学认识,认为武装暴动可以朝夕之间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为明天的组织工作准备良好的物质条件。其他一切都不属于我们的职权范围。”^⑤这种观点对公社的行动产生了不良引导:一方面,公社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急于废除国家;另一方面,公社委员们在会议上常常难以区分主次矛盾,纠缠于琐碎小节而延误了重要议题。同时,布朗基派习惯于少数人的密谋起义,不善于在运动中组织群众,这也是布朗基派不能对人民武装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原因。

蒲鲁东派虽然批判私有制,但崇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与布朗基一样,蒲鲁东也是对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恩格斯曾说过:“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不能立即就被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扫除,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历史意义。谁要去多少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就应当去熟悉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⑥相比于布朗基,蒲鲁东有比较系统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并提出了一套“旨在造福世界的理论”^⑦。但蒲鲁东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社会的历史无非是一个确定上帝观念的漫长过程,是人类逐渐感知

①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8卷第1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6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61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293页。

⑤ [法]奥古斯特·布朗基《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9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6卷第672页。

自己的命运的过程”^①。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下,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从抽象的社会平等理念出发,提出的所有权理论以及价值与货币理论,也落入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窠臼。蒲鲁东主张的“经济斗争先于政治斗争”的小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建立一个“不要政党、不要权力”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想,否认工人运动的有效性和无产阶级革命,同样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了危害。蒲鲁东在1865年去世,也未能赶上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动,但蒲鲁东主义和蒲鲁东派在公社中的地位影响到公社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蒲鲁东派认为交换关系决定了社会是否能够实现公平正义,因而反对没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担心此举会给社会交换和信用事业造成打击。蒲鲁东派主张建立“人民银行”来调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这是巴黎公社未能没收法兰西银行的思想根源。蒲鲁东派在经济领域没有贯彻执行消灭私有制的任务,造成了严重后果。在两军对峙的情况下,巴黎城内的法兰西银行仍然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凡尔赛政府提供资金援助,数目金额竟是其给巴黎公社缴纳金额的17倍之多。^②

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是巴黎公社的主要组织力量。两派领导公社战士浴血奋战,不妥协地对抗普鲁士侵略武装和凡尔赛投降政府,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但是两派在政治建设、军事领导、彻底消灭私有制等领域的政治实践失误,导致公社未能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四、结语

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的途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③。唯有通过符合实际的、彻底的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政治

实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飞跃。

巴黎公社的事业是“劳动者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解放的事业”^④。巴黎工人高举革命旗帜,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它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赢得了全世界革命者的尊崇与敬意。然而,巴黎公社的悲壮失败也凸显出社会理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公社急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就将国家权力全部移交社会,但客观上来看,公社社员的政治能力与社会理想的要求之间存在差距。公社社员的政治能力无法承接国家权力的转移,直接表现为政治生活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和对权威的废弃造成了公社政治秩序的失序。而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占据主要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架构,囿于激进社会主义思想和改良社会主义思想的干扰,无法坚决执行构建新社会应当完成的各项任务。纪念和缅怀巴黎公社,就要妥善对待巴黎公社的历史遗产。“不应当盲目重复他们的每一个口号”,而应当吸取公社政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考虑现实条件下社会成员政治能力的负载力和政治组织的执行力,及时对政治实践作出调整,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这是巴黎公社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文渊]

① [法]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7页。

② 参见[苏联]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4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55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20卷第224页。